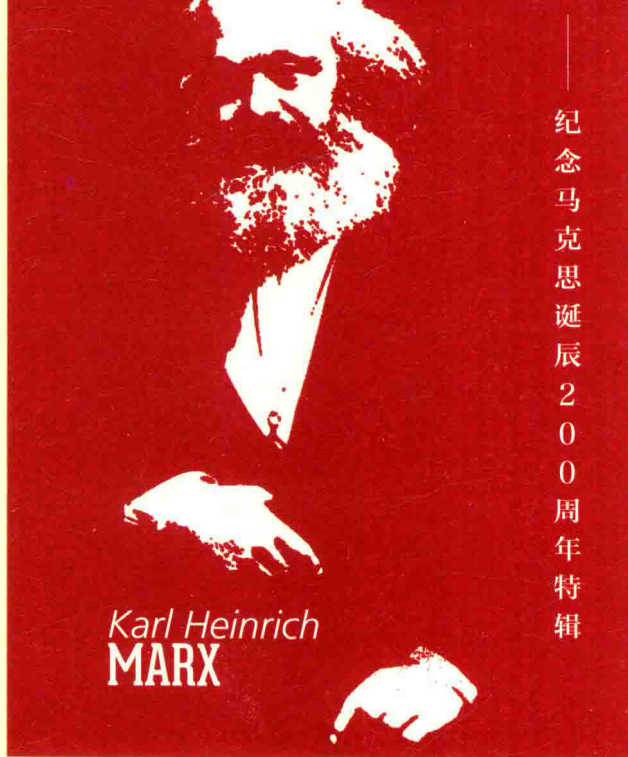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特辑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丛

# 马克思哲学思想 发展史研究

(第二卷)

张一兵◎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丛

# 马克思哲学思想 发展史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及其方法论特质  
(第二卷)



张一兵◎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第二卷目录

### CONTENTS No. 2

五大解读模式：从青年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

张一兵 ..... 281

马克思理论写作中的三类文本及其哲学评估

张一兵 ..... 290

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大理论制高点

张一兵 ..... 296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与党性原则

孙伯鍈 ..... 302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命题混淆了两种历史观的界限

孙伯鍈 ..... 307

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

——答鲁克俭和日本学者大村泉等人

张一兵 ..... 337

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

孙伯鍈 ..... 357

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与方法

孙伯鍈 ..... 366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视角及学术意义

——从对西方学界的几种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入手

|                           |     |
|---------------------------|-----|
| 唐正东 .....                 | 371 |
| 先在的自然、基始的实践与第一级的物质生产      |     |
| 张一兵 .....                 | 393 |
| 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深层内涵之我见         |     |
| 唐正东 .....                 | 398 |
| 关于马克思哲学逻辑转换中三个难题的深层解决     |     |
| 张一兵 .....                 | 413 |
| “两种生产”与唯物史观的实践本质          |     |
| ——兼论“经济史观”和“人学史观”的错误      |     |
| 姚顺良 .....                 | 423 |
| 马克思对人类学唯物主义的超越及其理论意义      |     |
| 唐正东 .....                 | 435 |
| 马克思对历史经验论的超越及其当代意义        |     |
| 唐正东 .....                 | 446 |
| 马克思的思想史效应及其意义             |     |
| 胡大平 .....                 | 459 |
|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     |
| 胡大平 .....                 | 475 |
| 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     |
| 胡大平 .....                 | 493 |
| 超越个体性哲学原则：马克思哲学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标志 |     |
| 唐正东 .....                 | 502 |
| 存在范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问题        |     |
| 孙伯鍨 .....                 | 514 |
| 本体论意识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消解与转型    |     |
| 唐正东 .....                 | 526 |

# 五大解读模式： 从青年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sup>①</sup>

张一兵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固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不同的论者那里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依据，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成熟论著。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框架中，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可能也有一个隐性的“凡是”逻辑：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东西一定是真理。所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可以在他的论文中不加任何特设说明，就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一卷引述到第五十卷。这种状态在今天我们一些论者的研究中还时常能看到。大约在列宁去世以前，人们很少会想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文本。可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一大批早期文本的发表，这一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从国外到国内，各类论者对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的解读，呈现出众多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语境。令人困窘的是，不同论者所依据的却都是马克思的第一手文本。特别是在我们国内这些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实践哲学、实践人道主义和价值主体哲学等命名而形成的各种非文本诠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一种显性思潮。依我之见，这是一场并未达及科学尺度的理论混战。因为，由于那条隐性的“凡是”逻辑，我们没有想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论著中的语境未必都是科学的！

---

①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6 年第 2 期。

当我们立足于马克思的早期文本时，反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文本产生了怀疑。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列举某种理论逻辑时，并没有界说自身的理论支援背景，即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内外讨论中已经出现过的各种解读语境。这就导致了我们在没有界定自己的理论边界时，就非法和轻易地说“我认为”。这种状况必然会导致科学讨论尺度的消失。

起码，在这一问题的当下讨论上，我们必须首先呈现已经发生了的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进行界说的逻辑域，即我称为五大解读模式的理论背景。然后，才有可能出现确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清晰评论视界。我在《人学的青年马克思：一个过时了的神话》一文中，第一次指出了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五大模式问题：这就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前苏联学者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鍈教授的模式。<sup>①</sup>在此，我再作一些进一步的阐释和补充。

第一个解读模式，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神话。所谓“马克思学”，即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将马克思的文献作为“客观的”历史文本对象的研究活动。固然，“马克思学”正式挂名于20世纪50年代末，但这种研究倾向在西方很早就出现了。<sup>②</sup>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就提出了青年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与老年马克思（《资本论》）的区别。而当1924—1932年，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1845年以前一大批马克思早期论著（《中学作文》、《博士论文》的材料、柏林和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问世后，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立刻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新发现的马克思”，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最高峰（换句话说，叫最有价值的人学的青年马克思）；而《资本论》时期以后的马克思则是“停滞”与“衰退”的马克思（老年马克思），这也是从恩格斯一直到斯大林以后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论据。以他们之见，这两个马克思恰恰是

① 参见张一兵：《人学的青年马克思：一个过时了的神话》，载《求索》1995年第1、2期。

② “马克思学”（Marxologie）为法国当代学者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首创。1959年，吕贝尔用“马克思学”这一术语命名由他创办并任主编的刊物——《马克思学研究》。

相互反对的。这就是当时很有名的所谓“两个马克思”的观点。具体分析，西方马克思学的这一观点也是十分复杂的。

著名的马克思学家吕贝尔的观点可以简要概括成一句话，即：“马克思批评马克思主义”。他根本就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依他之见，马克思本人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什么“马克思主义”（“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一术语最早是第一国际内的巴枯宁分子杜撰出来用以攻击马克思的。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开始也并不接受这一提法，后来才默认了这一不正确的命名。吕贝尔否认恩格斯后来概括的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因为这是后来马克思主义立论的根本。所以他主张将马克思的归结为18点。<sup>①</sup>其中的要义是以早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点，进一步引发出来的所谓伟大的“乌托邦主义”，即一种人道主义梦想的合理性。因此他说，马克思给人类留下的主要是一个响亮的道德呼唤。另一位西方马克思学学者费切尔也依循这一思路，公开提出要用早期的马克思人道主义批判精神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这里的主要观点是根本否定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而推崇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当然，在后来的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那里，他们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开始承认两种马克思主义，一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叫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一是正统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自然又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在后来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后，又开始提出将马克思的论著当作一部全集来读（阿温纳里），但这又是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来诠释其后期论著的。这种新的观点就与下面第二个解读模式有关了。

第二个解读模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与西方马克思学有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解读模式。我以为，对于中国理论界来说，界定这一模式是尤为关键的，这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理论家正是在无意识地重复运演着这一解读方法。众所周知，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人，虽然

<sup>①</sup> [法] 吕贝尔：《吕贝尔论卡尔·马克思五篇论文》，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在其哲学理论重建中也隐性地确证主体性，但由于马克思的大量早期论著当时并没有出版，所以他们基本上还从马克思的成熟的文本出发的。如用总体性、物化、实践哲学和主客体辩证法等规定来张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方面。甚至可以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要区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而在1932年以后，随着马克思的早期论著陆续发表，也就形成了一种显性的人学的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是在第二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家（如早期的弗罗姆所著的《马克思的人的概念》，还有早期的马尔库塞、列斐弗尔与后期的萨特）那里实现的。依他们之见，并不存在着西方马克思学所说的两个完全对立的马克思。与前面的西方马克思学不同，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们采取了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统摄全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即只有一个马克思，这就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也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即以消除异化获得人的解放为最高目的的马克思主义。<sup>①</sup>

在他们的哲学思路中，马克思主义的确立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实现的（他们并不重视1843年以前的青年马克思）。马克思那种先验的劳动异化史观的人本学逻辑，被直接指认为是真正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根据。而后来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从主体出发”的实践（=劳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人类的解放问题（特别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大纲”的发表，当时被称为继1844年“手稿”发表后的“第二冲击波”），甚至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都不过是原先人本学逻辑的展开。这样，他们必然指认恩格斯特别是第二国际以后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诠释成“无人”的经济决定论是非法的。<sup>②</sup>

这一解读模式，后来为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所承袭（如南斯拉夫

① 参见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需要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代的思想家，特别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中后期（20世纪40年代中期始），出现了我称之为“后人学”的逻辑转折。即以阿多诺为理论主线，后来又影响了不少学者的反人本主义主体论和同一哲学的“否定的辩证法”。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撰文专述。



的“实践派”和波兰学者沙夫的晚期人学理论)。在我国国内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人道主义异化讨论中,包括今天我们一些论者的“实践哲学”和“实践人道主义”的文本中,都可以看到这一逻辑(并无思想史层级上理论新建树)的有意或无意的显露。

第三种解读模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学派的所谓“断裂说”。质言之,也可以称之为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异质论解读模式。这恰恰是在对前述第二种解读的理论反驳中形成的。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作断裂式的理解,最初是由 1960 年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的。在他非常著名的《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以科学主义(主要是结构主义)方法重新分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sup>①</sup>在这里,阿尔都塞没有从一般文本的语义层面出发,而是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深层理论结构(“问题系”,即提问的基本方法和逻辑结构)出发,指认了存在着以 1845 年 4 月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分界线的两个马克思:即处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框架中的青年马克思与创立了全新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他也只承认一个马克思主义,但这是科学的(恰恰是关于客观社会结构历史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其深层逻辑上马克思主义恰恰是“拒绝理论上的人本主义”的!在阿尔都塞的解读中,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被绝对地一分为二,先前在人本主义意识形态构架中出现的理论主题(“主体”、“劳动异化”与“人道主义”),在后一个科学构架中被完全地抛弃了。马克思是在一个全新的理论场地中建构其全新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在这里,历史恰恰是“无主体”的,那种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神(目的因)的“人”之异化与复归的整个先验逻辑都被清除了。对于前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解读模式来说,阿尔都塞的观点可谓釜底抽薪。

与此观点比较接近的还有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论点:即 1845 年 4 月马克思从异化逻辑向物化论逻辑的转换。当然,广松涉的观点由于受到海德格尔和当代其他思潮的影响,这又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变体。<sup>②</sup>

① [法]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② 参见张一兵:《广松涉的马克思关系本体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 年第 4 期。

国内学者中受到阿尔都塞影响的有胡万福的《青年马克思》一书。<sup>①</sup>

第四种解读模式，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较为普遍的“进化说”。这是苏联（戈尔巴乔夫以前）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初苏联学者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观点（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70年代以前，苏联理论界对人的问题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并直接干预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倾向。而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苏联学界实际上是回到了上述第二条思路，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戈尔巴乔夫的“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式的“新思维”的逻辑就是理想化的人本主义。这一自欺欺人的观点所造成的现实悲剧已是有目共睹的了）。由于他们限于列宁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分期观点的框架（列宁没有看到后来发表的马克思早期论著），主张一种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彻底的观点。他们指认1843年《巴黎笔记》以前的马克思为“仍然是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的”青年马克思，而宣称1843年夏天马克思已经开始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但他们不敢确证这一转变并不是转向马克思主义）过程，这一进程一直到1845年4月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持续到1846年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告完成。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成了一个量的渐进过程，其中至多存在一种不断清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影响和走向成熟的理论表述的因素，在1843年夏天以后的众多青年马克思的文本中，马克思主义被到处地指认出来。<sup>②</sup>马克思后来称之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方法，在此却表现为猴体就是人体（这一观点是由我的一位研究生陈胜云在其一篇作业中最先提出的）。这样，184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革命意义就被大大弱化了。面对1930年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的严重理论倒退，这一模式由于自身的混乱和矛盾而显得苍白无力。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解读模式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始终成为苏

① 参见胡万福：《青年马克思》，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苏联学者在这一方面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是拉宾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巴加图利亚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莫斯科，1976年版）。并参见沈真编：《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性模式，在人们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时，这都是作为既定的前提来接受的。同样，我国国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不少论者，基本上都依循了这一进化论式的苏式研究思路。

第五种解读模式是由我的老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孙伯鍈教授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提出的。具体说，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文本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sup>①</sup> 在孙先生的研究中，青年马克思也被具体地一分为二，一是 1837 年加入到青年黑格尔哲学阵营一直到 1843 年夏天以前，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主要受到经过青年黑格尔改装过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包括他的《博士论文》及《莱茵报》时期的一系列文章；二是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在现实问题的困窘下，通过以法国大革命为重心的历史学研究，在魏特林、赫斯和青年恩格斯的影响下，发生了第一次（并不是自觉开始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思想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一般共产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时期包括青年马克思 1843 年夏天以后写下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章、最初研究经济学的《巴黎笔记》及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完成的著名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1845 年 3 月写下的评李斯特经济学教科书的“札记”。而第二次转变则是在评李斯特一文中初见端倪，并发生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柯夫》和《哲学的贫困》的真正自觉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革命。这种转变是一次完形的整体转换，而不只是一个量的渐进过程。只是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才第一次确立了实践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视界，这不是什么哲学体系，而是一种活的科学立场观点方法，也是在此时，才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

更重要的理论进展是，孙先生第一次提出了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类文本中，青年马克思虽然已经在哲学基本立场上转到了费尔巴

<sup>①</sup> 详见孙伯鍈：《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但在其理论运演的深层，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逻辑：一是从工人的先验类本质——劳动出发，将社会历史（主要是现代工业文明）视为人的本质之异化和复归过程的人本主义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构架，这是此时支配第二时期青年马克思哲学的主导理论框架；二是在马克思真实地接触到无产阶级实践和经济学史实中，不自觉发生的一种新的从历史客观现实出发的理论逻辑（这也是在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被直接指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的东西），但这并非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本身的确立，而不过是一种正在随着马克思对现实之深入进程中，不自觉地被动地对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偏离。这一理论逻辑是客观存在的，但对马克思的显性意识来说又是无意识的。在1844年到1845年3月间，这两条理论逻辑始终处于一种对立和动态的相互消长之中，但在青年马克思这时整体的理论运演中，居支配地位的还是费尔巴哈式的人学劳动异化史观。从理论深层来看，这种固然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说话的人本主义伦理价值批判，还没有根本上超出（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到1845年4月马克思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才真正发生了自觉的哲学革命，即原来在1844年“手稿”中那个人本学话语被彻底解构了，而新的以实践为入口的哲学新视界被突现出来（这一革命的完成，是通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包括费尔巴哈特别是赫斯和马克思恩格斯自己1845年3月以前观点的批判清算后才实现的）。与阿尔都塞的论断不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没有被形而上学地“断裂”为两个截然相悖的时期，而是一个复杂的有关联的动态矛盾运动和转化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从此不再关心人、关心主体，而是在一个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确立了科学的人学。这种人学不是人本主义，而通过关注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具体社会主体向度，在19世纪以来大工业已经确立的人类解放的客观现实可能性上，展望了作为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和前景的共产主义航向。

对于这最后一种看法，特别是我们与阿尔都塞观点的原则差别，我在近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作了进一步的显性系统确证。<sup>①</sup>

<sup>①</sup> 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特别是我觉得孙先生原来的一些表述由于传统的理论氛围的特殊作用，在某些论点的表述上还比较策略化，而这极易让读者在解读时与传统苏联的进化论模式相混淆。这也是我后来对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文本作重新解读的重要原因之一。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这里指认的所谓五大解读模式并没有一种时间先后顺序关联，它们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同时，这些模式只代表了这一理论思路中的典型范式，而不是绝对的覆盖模式。每一模式的存在的具体形态又是十分复杂和多变的。

最后还有一点题外话，即在对马克思的当代解读中所出现的、但已经是一种非肯定话语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理论逻辑实际上是从法兰克福学派中后期发端的。准确地说，这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主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首开先河的。当然，这一逻辑思路的初始起点，是从卢卡奇在20世纪初将马克斯·韦伯的工具合理性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的嫁接中无意识地萌生的。这种批判意识不再仅仅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直接将逻辑之剑指向了工业文明的生产力，于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都成了非法的奴役之源，马克思的“大写的人”也就作为“人类中心主义”成了被批评的对象。这一论点先是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一书对同一性逻辑的批判中达到最高点，进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后现代思潮，特别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得到全面论证。显然这一新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我们这里所规定的对马克思的肯定性解读，对此，笔者准备另撰文详述。

# 马克思理论写作中的三类文本 及其哲学评估<sup>①</sup>

张一兵

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深入的进程中，一个问题逐渐地变得重要起来了，这就是马克思理论文献的文本分类学研究。认真反省一下过去的岁月，在传统理论教科书体系教学和学术探讨中，我们较多地关注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理论文本，并将其视为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主要文献依据。究其客观原因，是由于马克思的大量笔记和手稿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才逐步问世（就中文版的文献来看，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献没有翻译过来）；而更主要的因素是我们自己解读构架的错误引导机制，即总是认为在正式论著与笔记手稿之间，存在着简单的成熟与不成熟的界限。其实，这种看法本身倒真是不成熟的。以我之见，马克思理论写作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基本类型和具有各自意义和价值的文本：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重视和研究的往往多是第三类论著，第二类文献得到一定的关注，而第一类文本实际上还没有获得应有的解读和研究地位。而我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恰恰是在第一、二类文献深入解读中，才可能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和缘起性语境。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第一类文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面对自己所进入

---

<sup>①</sup>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3期。

的新的学术领域或尚不熟悉的文本，有目的地读书摘录的心得笔记，这还包括马克思用作记录一些研究提纲、重要书目和随想心得的记事笔记。从目前已经发表和整理的文献情况看，这类笔记本约有 250 本，其中经过马克思、恩格斯标示和批注的内容达 6 万多页，约 160 个印张。20 世纪 20 年代末，这些笔记开始部分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献第一版（简称 MEGA<sup>1</sup> 版）第一部分，70 年代以后全部重新发表在 MEGA<sup>2</sup> 的第四部分，约有 40 卷之多。现有文献显示，马克思是在大学学习期间（1836—1837 年之交）形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此后这一做法贯穿他的全部学术生涯。从马克思大量笔记的内容来看，在早期，除去诗歌、文学内容，主要是哲学、艺术笔记，如 7 本《伊壁鸠鲁笔记》（1839 年，现有中译本）、8 本《柏林笔记》（1840—1841 年，无中译文）和 5 本有关《波恩笔记》（1842 年，无中译文）、5 本历史政治摘录的《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 年，现有中译摘要）。而 1843 年以后，除去一些札记性记事笔记本（约有 17 本，其中重要的如《1843—1847 年记事笔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重要文本就写于这一笔记本）和中晚期的一些历史、人类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史笔记外，90% 以上都是经济学笔记。比较重要的如 7 本《巴黎笔记》（1844 年，部分中文摘要）、《布鲁塞尔笔记》（1845 年，无中译文）、9 本《曼彻斯特笔记》（1845 年，无中译文）和 24 本《伦敦笔记》（1850—1853 年，约 100 印张，无中译文）等。

在我看来，这些笔记是我们了解马克思各种思想的原发因素。因为在这些笔记中，我们可以直接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一些学术观点摘录的特定意向性，最初的随机性评论和由议论产生的写作计划和构想，其中，我们能找到马克思各种思想最初形成的理论激活点和渊源性线索。这些重要的原发性理论边界，是我们在一般理论手稿和论著中无法获得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笔记往往是理解第二类文本（手稿）的逻辑解读之钥匙。譬如，不研究《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为思考中轴的政治历史摘录，就无法完整理解马克思 1843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的第一个哲学转变，即向一般唯物主义的转变，也就可能出现传统研究中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转变简单地视为对费尔巴哈的“拥护”，而忽略马克

思自己的独立思考；不研究 1844 年的《巴黎笔记》中马克思从萨伊、斯密、李嘉图到穆勒的经济学递升式理解逻辑及其深层转换，就不可能科学地解读同期同体写作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本真语境，从而失去对手稿理解评估的客观基础；不研究 1845 年的《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致安年柯夫》，也就根本谈不上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二个伟大转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本质；不研究 19 世纪 50 年代的《伦敦笔记》，就不会深入发掘出《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内在哲学逻辑，这也就自然会与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重要哲学理论建树失之交臂，等等。再如马克思的《1844—1847 年记事笔记》，实际上也是马克思哲学变革时期真实思想历程的一种记载。除去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记事本上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思考提纲，即《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和《札记》<sup>①</sup>。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许多重要写作计划（现代国家问题的写作提纲、社会主义者丛书计划），以及一部分十分关键的读书摘要（汤普逊笔记和普鲁东《贫困的哲学》笔记），都出现在这一记事笔记本上。这一记事笔记成为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不少微观缺环的连接构件。

非常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一文本群的研究是十分不够的。而苏东学者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MEGA<sup>1</sup> 出版部分笔记以后，特别是 80 年代开始出版 MEGA<sup>2</sup> 第四部分全部摘录记事笔记以来，已经产生了一批全新的极有价值的成果（苏联学者拉宾、巴加图利亚、马雷什，德国学者耶克等人的研究成果）。我国中央编译局的研究人员也在 80 年代以后介绍和编译了部分成果。但由于这部分文本的绝大多数笔记至今没有编译出版，所以研究工作在客观上是难以展开与深入的。由此我认为，在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译中，这一部分内容的出版是应该优先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战略问题。

第二类文本是马克思的每一理论创作前期所形成的手稿与有关理论研究的各类学术书信。这基本上是马克思理论创造的原始地平，因为这是马

<sup>①</sup> 参见张一兵：《马克思走向哲学革命的第三次非常性思想探索》，载《哲学研究》1996 年第 2 期。



克思自己弄懂问题，建构新理论的思想实验室。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一些未完成和主动放弃的理论手稿和文本初稿，如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1844年的《评穆勒手稿》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年初的《评李斯特手稿》、19世纪50年代末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79—1880年的《评瓦格纳教科书手稿》等；还有马克思在一些重大理论创造进程的多重修改稿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多重手稿、《资本论》的多重手稿和《致查苏里奇的信》的多重手稿。在马克思的书信中，特别是他与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有关思想探讨的私人通信也是极其重要的文本。比如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卢格等人的通信，1844年至1845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1846年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19世纪50—80年代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通信。

在这些手稿和书信中，能最真切地看到马克思思想形成和建构进程中许多没有经过修饰的最真实的语境和发展过程。从研究和表述的差异性上说，有的手稿和书信的重要性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超过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论著。比如马克思在1846年底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过程中写给俄国理论家安年柯夫的信，就直接反映了他在理论思考中的一些新的观点，即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统一起来的“一定的”具体历史情境论<sup>①</sup>。再如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传统的研究中（主要是经济学），学者们一般总将这一手稿仅仅作为经济学文本进行解读，并且以《资本论》的经济理论建构（剩余价值理论）的成熟度为评判尺度，甚至将这一手稿简单地判定为“《资本论》草稿”，这就极大地忽略了这一文本中丰富的哲学成果。而以我的观点，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手稿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创造，即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这可以视为马克思哲学发展的第三次重要转变和飞跃。因此，这个手稿应该叫《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有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隐性制约方面，这就是在原来对这一类手稿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

<sup>①</sup> 参见张一兵：《马克思致安年柯夫信解读》，载《江汉论坛》1997年第2期。